

对外改革，对内开放，促进产业升级

余森杰 王宾骆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实现了行业内和行业间的产业升级。大部分企业的生产率明显提高，出口的产品专业化、差异化更加明显。这一经济现象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无疑是最主要的两股动力。

要保证中国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内继续实现产业升级，提升企业生产率，需要转换改革开放的思路，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转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对外改革主要出口目的国家，加强主要的自贸区建设；对内则开放国内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深化经济改革，实现产业提升。

关键词：产业升级 企业生产率提升 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保持了世界瞩目的增长速度。本世纪以来其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10%，按照当前美元价格计算，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元现价）达到9万亿美元，为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可望在2014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与此同时，201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800美元，这一数字远高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线（3946美元）。

此外，第二产业是中国经济极为重要的组成。中国第二产业的规模在2013年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国民生产总值占比为44%。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第二产业平均年增长率常年维持在13%左右。显然，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

余森杰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宾骆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生。

[1] Feenstra, Robert, “中国有多大?”, 《经济学（季刊）》, 2012年第11卷第3期, 第367~382页。

当今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已成为全球的“加工厂”，不过随着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中国工业制造业能否实现转型升级，产业价值链的提升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即制造业价值链提升的问题。具体地，本文讨论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产业价值链提升为什么重要？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产业价值链是否有所提升？第三，当前产业升级面临什么挑战，动力是什么？这些动力因素目前面临着怎样的挑战？第四，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如何促进产业升级？

产业价值链提升的重要性

二战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其收入由最不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低于3666美元）升到中等收入国家时（人均收入在3666~10000美元间），经济很容易从此徘徊不前，人均国民总收入无法继续快速爬升，从而无法顺利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南非等国都陷入这一困境。同时，也有一些中等收入国家成功地避开了这一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比如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1987年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韩国则于2001年实现了这一目标。^[1]

为什么这些国家会掉进“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呢？通常来说，发展中国家人口或自然资源丰富。它们根据本身的要素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品，要把人均收入从低收入水平提升到中等收入水平，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但是，随着GDP增长，工资相对上升，同时，伴随经济增长，人口增长率降低，老龄化渐现，致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下降。再者，自然资源随着经济的发展日益稀缺，“资源粗放式”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呢？经济学界在这点上有一共识，就是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业绩效，实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升级。判

[1] 中高收入国家的分类可查世界银行网站 <http://data.worldbank.org/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a-short-history>.

断产业是否升级的指标有多个，但对中国而言，出口产品的复杂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国际比较窗口。如果一国的出口产品的“出口复杂度”高于其他国家，则该国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可能性比较低。因此，我们运用罗德里克提出的“出口复杂度”（EXPY）指标^[1]计算了各国在2008年的“出口复杂度”^[2]。所谓出口产品复杂度，就是指一国所有出口行业收入的加权平均值。一国出口产品复杂度越高，它生产的产品就越尖端，技术含量就越高，也就越容易实现产品价值链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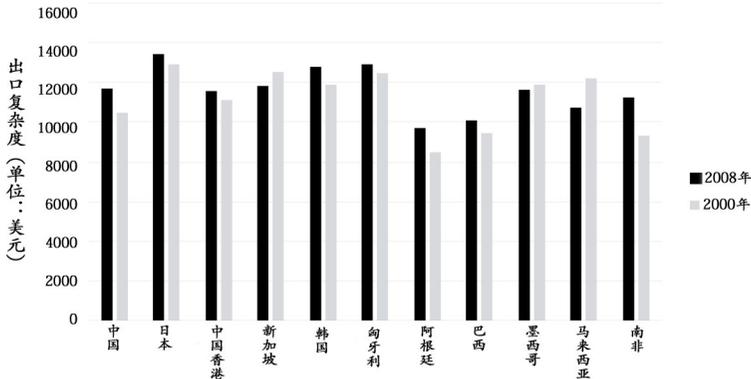


图1 中国与经历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国家出口复杂度水平比较

图1列出了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几个国家（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南非）以及成功跳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另外几个经济体（日本、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然后再用中国的出口复杂度与它们进行比较。

[1] Rodrik, Dani,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China & World Economy*, 2008, 14(5), pp. 1-19.

[2] 为了衡量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我们使用了郝斯曼（Hausmann）和海德尔格（Hidalgo）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即构建一个指标，将一国内人均GDP包含在出口指标中。这可以通过两个步骤来实现。第一步是构建一个包含人均GDP平均值的指数（PRODY），用每个行业的比较优势程度来作为权重。

$$PRODY_j = \frac{\sum_c (EX_{j,c}/EX_c) Y_c}{\sum_c (EX_{j,c}/EX_c)}$$

式中分子中的 $EX_{j,c}/EX_c$ 是c国国内行业j的出口额与出口总额

的比例，分母 $\sum_c EX_{j,c}/EX_c$ 是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出口比例进行加总。 Y_c 是c国的人均GDP值。换言之，

PRODY指标可理解为行业的生产率水平指标。因此，PRODY指数可以用来避免因国家收入水平变动而导致的行业扭曲。为了更明白地说明这一点，下文中我们构建了表明收入（生产率）水平的EXPY

指数，用来衡量某国的一揽子出口品的情况： $EXPY_c = \sum_j (\frac{EX_{j,c}}{EX_c}) PRODY_j$ 。这里，EXPY指标是c国

国内所有行业的PRODY指标的加权平均数。

可以看出：1) 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其他国家在近10年内的出口复杂度呈上升趋势；2) 未摆脱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比成功摆脱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复杂度水平较低；3) 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水平比未摆脱困境的中等收入国家要高，和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相近，甚至更高。前面两点的比较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产品出口复杂度越高，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越低。第三点发现启发了我们关注如下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产业价值链有没有升级？

中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经验事实

本部分探索新世纪以来中国产业价值链升级的经验事实。把研究的时间维度集中在新世纪，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在新世纪保持着高速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样本；其二，新世纪后微观数据更为丰富，可从企业微观层面来分析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发展^[1]。

在下文中，我们将首先分析制造业由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甚至高科技产品的变革。价值链的升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行业间的生产“宽度”和行业内部的生产“深度”。然后，我们从生产深度和中间产品投入来研究加工贸易在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作用。最后，我们根据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采用可靠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测算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上分析结果均证明中国正在进行着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

（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

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对外贸易是了解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理想窗口。我们首先考察各行业之间外贸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农产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5%，而工业制品出口占65%。工业制品进口则占进口总额的65%。今天，中国的贸易模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到2007年时，工业制品占出口总额的96%，其中重工业出口占86%。其中，高资本密集度产品出口又占了73%。同时，工业制品进口则占进口总额的77%，而机械制品和运输设备的进口占其中的44%。

[1] 在1998年之后，国家统计局开始提供含有所有国有企业和年营业额超过500万人民币的非国有企业的年度会计报表。

新世纪以来，中国出口与GDP之比在35%左右，出口占第一、二产业产值的60%。为了解中国如何实现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我们集中考察了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出口比例（即某一行业的出口量与所有行业总出口量之比）。电器行业在1998年时有最高的行业出口比例（23.7%），其次是纺织业（22%）。鉴于中国是个劳动力资源丰裕的国家，因此中国有如此巨大的纺织业出口是再正常不过的。经典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预测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中国）会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如机械制品。但奇怪的是，中国却存在着大量的机械产品出口。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个现象愈发明显。2008年时电器设备的出口比例上升至42.7%，与此同时，纺织业的出口比例下降到了12.6%。

更有意思的是，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有明显份额。高科技产品的大量出口成为中国的价值链升级的重要特征。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占制造业出口总额的30%，这一比例甚至高于美国。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产品中大部分是计算机和通讯产品，占2009年中国的高科技出口总额的74.2%。其他重要的技术产品包括电子产品（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13.3%）、光电技术（5.9%）和生科技术（3.2%）。

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能够有大量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加工贸易的快速发展。加工贸易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中国、墨西哥和越南）很普遍的一种贸易模式。国内企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利用国内的加工技术进行加工，然后向国外出口最终产品。为了鼓励加工贸易，政府通常为待加工的中间产品提供关税免征、减征、退税等优惠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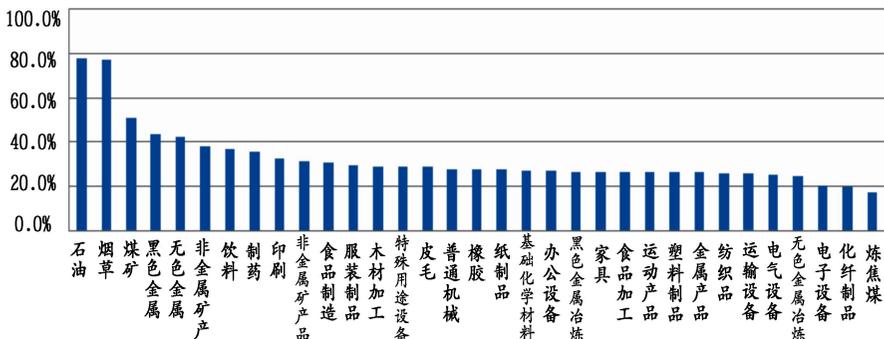


图2 中国制造业产品的“生产深度”（附加值与产出之比）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我们从以下两个角度检查加工贸易的发展情况。首先，到底是哪些行业用了较多的进口中间品呢？我们发现，机械部门和非金属矿业部门使用了大量的进口中间产品（比例分别为30%和17%），而纺织业只使用了12%的进口中间产品。这与直觉相符：机械行业大量使用了从日本和韩国进口的零部件和原材料。

其次，哪些从事加工贸易的行业产品的附加值较高呢？图2按照产品的“生产深度”（即产品附加值除以产值）对所有的制造业进行排序。可以看出，矿业的附加值较高而电子设备的附加值较低。以苹果公司的iPod为例。中国生产的一台iPod的出口值是209美元，但在中国实现的产品附加值只有9美元。不过，这也就引出相应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产业能够实现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提升呢？

（二）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增长

不同的产业附加值实现之所以大小不同，最主要原因就是企业的生产率高高低不同。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指出的：“生产率不是全部，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高的利润，从而推动了整个行业利润率的上升，并实现产品升级换代，产业价值链得以提升。他认为，大部分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靠的只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才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遭到重创。那么，中国工业企业目前的生产率水平如何？生产率是否逐年上升？

目前，学术界衡量生产率通常有两种方式：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即是企业产品附加值除以工人数，它的优点是计算方便，但缺点是过于简单，无从衡量资本和中间产品的贡献，因此，比较可靠的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企业的生产率，它的衡量通常是用观察到的产出和最小二乘（OLS）估计值之间的差距。我们因此用了国家统计局收集的大中型“规模以上”企业样本来衡量中国企业的生产率。^[1]

[1] 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是用观察到的产出和最小二乘（OLS）估计值之间的差距。然而这种方法通常存在联立因果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所以我们采用了Olley-Pakes方法（表1中称为“OP”）来克服这两个问题（Olley, Steven and Ariel Pakes,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 *Econometrica* 64(6), 1996, pp. 1263-1297），详见余淼杰：“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来自企业层面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第97-110页。

表1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2000—2007年）

中国行业分类代码(2位数字)	劳动力		资本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
	OLS	OP	OLS	OP	OLS	OP
食品加工 (13)	.510	.443	.262	.323	4.338	4.120
食品制造业 (14)	.487	.423	.285	.424	4.033	3.166
饮料制造业(15)	.522	.453	.305	.037	3.806	7.210
纺织业(17)	.490	.439	.255	.199	4.110	4.832
服装、鞋、帽制造业(18)	.485	.508	.238	.339	4.230	3.322
皮毛制造业(19)	.482	.494	.274	.364	4.086	3.295
木材加工及制造,竹、藤、棕、草制品(20)	.491	.439	.250	.410	4.295	3.362
家具制造业(21)	.551	.569	.212	.400	4.268	2.705
造纸及纸制品业(22)	.556	.500	.271	.249	3.728	4.174
印刷业(23)	.504	.472	.284	.031	3.774	6.066
文体教育类 (24)	.509	.505	.218	.139	4.235	4.876
石油加工、炼焦及燃料(25)	.372	.268	.421	.478	3.383	3.345
化学原料制造 (26)	.395	.329	.340	.248	4.124	5.196
医药制造业(27)	.505	.503	.313	.481	3.928	2.404
化纤制造业 (28)	.494	.341	.336	.510	3.590	2.713
橡胶制品业 (29)	.420	.374	.335	.414	3.884	3.452
塑料制品业(30)	.435	.434	.298	.561	4.110	2.067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31)	.383	.303	.296	.296	4.412	4.796
黑色金属冶炼及冲压(32)	.548	.476	.332	.512	3.617	2.385
有色金属的冶炼及冲压(33)	.482	.377	.293	.411	4.173	3.655
金属制品制造业 (34)	.469	.408	.304	.448	3.932	3.052
通用设备制造业 (35)	.485	.388	.291	.269	3.989	4.611
专用设备制造业 (36)	.483	.426	.270	.050	4.231	6.32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7)	.538	.435	.322	.293	3.545	4.300
所有行业	.455	.407	.311	.283	3.752	4.267

注：受篇幅所限没列出标准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索要。

表1列出我们估算的中国各个工业制造业的劳动力、资本弹性系数，据此可计算企业的生产率（结果列在最后两列）。从中可见，各个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均较高，通过计算各年的增长率，布拉德特等根据中国企业的生产数据发现，在1998—2006年期间，使用总生产函数计算的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2.7%。^[1]我们发现，如采用附加值来计算，平均而言，新世纪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7.5%左右——中国企业的生产率有较大的增长！这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产业价值链升级，同时也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宏观经济能够保持8%左右的年增速。

中国进一步产业升级面临的挑战

上面大量的经验典型事实已证明：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的确经历了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提升。更进一步地，我们想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产业升级：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首先，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可以支付相对较低的工资。^[2]给定其他因素不变，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企业能够有充分的资金进行产业升级。^[3]在改革前二十年中，中国出口的大部分是服装和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正是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预测是一致的。一个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理应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充分利用其比较优势。目前，中国加工贸易之所以能占外贸的“半壁江山”，也正是利用了中国的低价的劳动力优势。

而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中国产业能够升级，价值链得以提升的主要原因在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正如克鲁格曼所强调的：比较优势不是各国贸易唯一的原因，规模经济是另一种贸易收益的来源。国家可以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从贸易中获得收益。事实上，中国的市场规模不仅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国内市场也在新世纪蓬勃发展。例如，到2009年底，中国已实现近1500万台（辆）的汽车销售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那么，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还能

[1] Brandt, Loren, Johannes Van Biesebroeck, Yifan Zhang, “Creative Accounting or Creative Destruction? Firm-Leve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97, pp. 339-351.

[2] 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姚洋、余森杰：“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金融研究》，2009年第9期，第97-110页。

不能存在呢？同样，加入WTO后得到的市场扩大效应会不会继续自动地发挥它的作用呢？或者说，中国较大出口市场规模能不能继续得到保证呢？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正面的回答，那下一个十年产业的升级，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就得不到有效的保证。

先来考察一下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变化。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沿海地区的企业工资成本大幅上升，并由此逐渐辐射到中部内陆省份。同时，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逐渐明显，人口抚养比上升速度较快。^[1]虽然学术界对中国目前是否已达到“刘易斯拐点”的看法并不一致，但对工资成本的上升却无异议。虽然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还比较低，但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比却相对较高。由于这些东南亚国家出口也多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所以中国工资水平的相对上升就削弱了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的国家竞争优势。同时，由于中国在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就会更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实现。

再来考察一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受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贸易形势相较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变化有三：第一，传统的主要出口国经济乏力。一直以来，欧美日都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但欧盟各国受严重的债务危机影响，经济复苏缓慢，平均GDP增长速度只能徘徊在0.7%~1.5%附近。日本在2011年遭受地震、海啸、核辐射三重天灾人祸后，短时期内经济难以复苏。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失业率更是一直居高不下，持续稳定在8%左右，近期虽因美国政府采取“制造业回流”等多项刺激政策，经济停止滑坡但依然增长乏力。

第二，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中国同其他发达国家（包括出口产品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有更多局部贸易摩擦。有学者预测，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第二个十年将停滞不前，长期的低增长将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常态”。为保护本国就业，发达国家必将会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作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摩擦势不可免。比如，近期由于中美存在巨额的双边贸易逆差（2011年中美贸易逆差近2200亿美元），美国势必对中国采取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主要是针对某些行业的反补贴、反倾销的“双反”措施，以保存本土同类

[1] 姚洋、余森杰：“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金融研究》，2009年第9期，第97~110页。

产品的国内市场。哪些行业会首当其冲呢？主要是在一些两国间竞争力势均力敌的产业，或者说，是两国比较优势都不明显的制造业，如汽车零部件、光伏产业、铜版印刷纸等。

第三，为了促进美国的出口，2011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力推目前已有9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强调将建成高水准的自由贸易区（FTA），十年内实现区内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所有商品零关税，并涉及市场透明、金融监管等领域。TPP生效后，美国会从越南等东盟国家直接进口纺织类等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原因很简单，虽然中国的同类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比东盟各国成本相对较低，但因为TPP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关税为零，美国转而从东盟各国进口，将会使中国同类产品出口中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受到负面的冲击。以上这三个方面都说明了中国面临的出口国际市场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并不乐观。

进一步产业升级的政策建议：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要保证中国能进一步顺利的产业升级，笔者以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应该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政策方向进行调整，赋予改革开放的国策新的内涵，重点方向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对外改革并非是停止开放，而是强调改革对外开放的方式和内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格局。

对外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主要出口目的国。欧美市场一直是中国贸易的主要伙伴，消化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大部分。过度依赖主要的贸易伙伴可能带来系统性的风险，当这些经济体不景气时，大幅度减少进口中国产品，将导致中国出口行业波动加剧。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更加关注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市场潜力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俄罗斯、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南非等。俄罗斯于2011年正式加入WTO后，必然会放开一系列的产品市场，同时进口关税也必将大幅度下降，给中国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提供了绝佳的机会。通过发展新的贸易伙伴、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外贸中的比重，可以有效地分散世界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减少中国出口部门的波动，为出口行业提供更为有利的发展条件，使其能够提升生产率，推动产业升级。

对外改革的第二项任务是做实东盟10+3自由贸易区。目前东盟10+1（中

国)已有一定基础,但还要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制度建设把中国—东盟自贸区做实。当前,东盟国家对中国出口比较容易,而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增速缓慢,原因在于东盟并没有对中国产品实行零关税,而中国对东盟93%~97%的产品都实行了零关税。双方制度化建设的不对等使得中国当前从自贸区中的获益还不是很。更重要的是,要大力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因为日韩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中间品进口国,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之一,所以,“中日韩自贸区”对促进中国的外贸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日韩三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力量,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三国的经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日本朝野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对日本经济的正面促进作用。而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不景气,各方合作意愿加强,正是推进自贸区建设的大好时机。

对外改革的第三项任务是调整加工贸易方式。首先要减少来料加工比例,增加进料加工比重。而在进料加工中,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的转型升级不应成为一句空话。中国的加工贸易促进了就业,但问题是最终出口品附加值太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是提高出口品附加值的唯一方法。而如何转型升级呢?则重在研发投入。研发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对传统工序的优化和创新,另一种则是生产全新的产品。我们的研发重点应放在第一类。改进传统工序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同时中国科技水平同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对现有技术的改造、再吸收是更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战略。

同样,对内开放不是说要止步改革,而是说改革应当更加关注开放国内市场。通过开放产品和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实现产业升级。

对内开放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国内各地区间贸易壁垒,降低地区贸易成本。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发展程度差异还很大。如果能够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腾笼换鸟”的产业政策,将为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但是目前各地区的行政机关仍然思想僵化,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巧立名目地设置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地区壁垒,使得地区间贸易难度甚至要大于对外贸易。这严重制约了各地区的协同发展,也阻碍了各地区的产业升级。

对内开放的第二项任务是逐步开放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有效运行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环节,直接影响着生产的效率。相较产品市场而言,中国要素市场的准入门槛还很高,行政指令色彩比较浓重,这制约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新一届政

府上台后，强调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逐步降低能源、电力、金融等行业的进入门槛，让民营资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加强竞争、提升效率。同时，劳动力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改革户籍制度、放开二胎政策是开放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应有之义，因为改革户籍制度能够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最优就业结构；放开二胎政策则能有效应对老龄化渐现、人口红利耗散的现实问题。这两项政策，对于劳动力密集行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对内开放的第三项任务是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中国的产品市场上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定价，行政指令的成分已经很小。但是生产企业的税负还是很重，此外还有花样繁多的行政事业收费，这使得产品价格过高，而且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为了维持企业活力，实现产业的不断升级，需要减轻企业负担。不仅要进行结构性的减税、减少行政收费项目，减轻企业的负担，还要加快推进营业税改革等税制改革措施以减少重复征税、双重价格扭曲的低效率。

小 结

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重要增长极，中国实现了工业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的产业升级。中国企业的生产率也得到大幅提高，出口更多复杂的、差异化明显的产品，甚至还包括加工贸易模式生产的高科技产品。即使在扣除加工贸易的因素后，中国的产业结构依然在三十年中有明显的升级换代。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是中国产业不断升级的主要动力。

新世纪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产业升级所倚赖的两股动力（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不断弱化。为保证产业升级得以继续，企业生产率继续提升，应该赋予改革开放政策以新的时代内涵，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向“对外改革，对内开放”转变。对外改革，开发新的贸易伙伴，降低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的贸易依存以分散系统化风险，同时加快建设同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调整加工贸易模式。对内开放，破除各地区的贸易壁垒，放开各要素市场，进一步开放产品市场。通过“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政策，为产业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